

文章编号: 1674-0386(2010)01-0077-07

文学研究选择性创新和期刊编辑创新性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王齐洲教授访谈

杨继成¹, 郭子源²

(1. 石家庄铁道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2.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2009年8月23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主办了2009全国高校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暨学术发展前沿报告会, 邀请王齐洲教授做《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编辑选稿策划》报告, 反响强烈。王教授指出,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 而就研究者个人而言, 其学术创新只能选择在某个领域甚至这个领域的某个方向进行, 所以其创新也就不可能是全面性创新, 只能是“选择性创新”。期刊编辑的职责则是选择, 即选择那些富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在期刊发表, 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而这些选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 它体现出编辑的独到眼光和刊物的学术定位, 因此, 期刊编辑是在进行“创新性选择”。“选择性创新”与“创新性选择”,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造起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会后, 笔者就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选择性创新和创新性选择等问题采访了王教授, 今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关键词: 文学研究; 前沿问题; 编辑策划; 王齐洲教授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被采访者简介: 王齐洲教授, 男, 1951年生, 湖北洪湖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编委、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湖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出版有《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1)、《古典小说新探》(1993)、《湖北文学史》(1995)、《文圣孔子》(1998)、《呼唤民族性: 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2000)、《红楼梦与民俗文化》(2003)、《中国文学观念论稿》、《四大奇书纵横谈》(2004)、《长江流域文章风格的流变》(2005)等专著10余部, 主编或编著有“走近圣人丛书”、“四大名著文化读本”、《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精选(上、下)》、《新唐书·艺文志 著录小说集解》等。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国学研究》、《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1989年获首届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首届国家级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2000—2008年, 连续获得第二、三、四、五、六届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其主编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进入教育部名刊工程, 影响广泛。2008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授予其“全国高校社科学报事业突出贡献奖”。

杨继成: 王教授, 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多年,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湖北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观念史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 发表过不少有重大影响的论文, 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在期刊界也工作了十几年, 任《湖北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期间, 学报质量显著提升, 受到同行高度赞

收稿日期: 2009-09-14

作者简介: 杨继成(1970-)男, 副编审, 研究方向: 编辑与出版。

扬;出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使人文社会科学版进入教育部名刊工程,影响广泛。可以肯

王齐洲:谢谢您的鼓励。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只是稗贩,不是研究,自然无创新之可言。当然,任何学术创新都是在前人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应该如实地将借鉴与创新严格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反而更能够彰显真正的学术创新。这是就学术研究的道德层面而言。而就学术创新的技术层面而言,任何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创新,都只可能选择在某个领域甚至这个领域的某个方向进行,所以其创新也就不可能是全面性创新,只可能是“选择性创新”。

与学术研究工作不同,期刊编辑的职责是选择,即选择那些富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在期刊发表,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促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然而,编辑的这种选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与自己所编辑的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特色相一致,体现出编辑的独到眼光和刊物的学术定位,因此,期刊编辑是在进行“创新性选择”。

“选择性创新”与“创新性选择”,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造起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研究工作与期刊编辑工作殊途同归,这也是我们能够把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编辑选稿策划放在一起来讨论的理由。

杨继成:对于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认识。由于受到个人喜好和研究视野的局限,学者们也许会以为自己的研究是处于学术前沿的。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能否谈谈究竟哪些问题是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文学研究应从哪些方面“选择性创新”?

王齐洲:广义地说,一切学术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都有当下需要关心和解决的具体问题,说这些具体问题就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前沿问题,也未尝不可。然而,狭义地说,某一学科的前沿问题一定是能够促进这一学科创新,影响这一学科发展,而当前又必须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且,前沿问题与学术创新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没有前沿性可言,也必然得不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学术创新虽然具有广阔的领域,但大体而言,离不开创造新观念、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因

定,在做学问和做编辑方面,您一定有自己独到见解。能否谈谈您对做学问和做编辑的总体认识。此,凡是创造新观念,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的学术研究,就应该承认其处于学术前沿。就文学研究而言,其前沿问题自然也与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联系在一起。

杨继成: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和现在人们的文学观念是一样吗?文学研究的创造新观念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齐洲:在20世纪末,我曾应邀撰写过《转换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纪话题》、《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检讨——以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发展为例》等文,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有成就和不足是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有自己的文学观念,但这观念与20世纪人们的文学观念是不一样的。正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所说:“(古人)用那么艰深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文学’实指文治教化,包括礼乐典章知识和礼乐教化实践两个方面,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即使到了唐宋以后,文学观念也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所言:“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变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1902年,张百熙主持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改变了从前京师大学堂以《诗》、《书》、《礼》、《易》、《春秋》课士的传统做法,“略仿日本例”,以“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教学生,“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这时的“文学”包括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还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而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则将“经学”、“理学”等从“文学”中独立出去,但“文学”科目中仍然包括了“史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辞章、文法”等内容,林传甲便是按照这一章程所规定的“中国文学研究法”编写了供京师大学堂学生使用的《中国文

学史教材。这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很不相同,正逐步向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靠近。

直到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在一份大学章程中将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才与史学、哲学在学科上划清界线,文学观念也朝着更加西方化的方向演变,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才初步确立。

说是初步,是因为这时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还很不一致,例如“五四”运动前后,人们谈论文学所指就并不统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仍然是“大文学”的概念,以致钱玄同要向胡适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胡适因此拟定了判别文学的三条标准:“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而这三条标准其实并不是文学学科的标准,也不是文学文体的标准,实际是“文学性”的标准,因此并非大家都赞成。

而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如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4)、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之所以都不得不在绪论部分花较大篇幅来讨论文学的定义,便是因为当时对文学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直到1920年代末期,各种文学通史和分类文学史大量产生,学术界才真正形成对文学的共识,建立起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文学观念。

杨继成: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研究提出观念更新的前沿性问题了吗?

王齐洲:应该说,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首先就是观念更新问题。提到对文学观念的重视,只要看看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即可明了。该著第一编“绪论”的第一章即为“文学之定义”,这一章不仅列举了《论语》《易经》《说文》《释名》阮元《文言说》、刘勰《文心雕龙》等关于“文”的定义,而且列举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白鲁克、亚罗德、戴昆西、庞科士等关于“文学”的定义。作者主要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而又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一些内涵来为文学定义,以便展开文学史的叙述。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文学观念之重视。“五四”时期及以后,不仅钱玄同、胡适讨论文学观念,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茅盾等,都参与过文学观念的讨论。

梁实秋在《现代文学论》中甚至说:“我以为

中国文学之最应改革的乃是文学思想,换言之,即是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是甚么?文学的任务是甚么?中国过去对于这些问题是怎样解答的?我们现在对以前的解答是否满意?如不满意应如何修正?这些问题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将文学观念问题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中心问题”,其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前沿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20世纪前期,不仅在近30年的文学观念讨论中体现了这一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所有重要的学者几乎都参与了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那些最有创新性的文学研究成果就是文学观念更新的成果,或者说是新观念指导下取得的划时代的新成果。

例如,王国维于1905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1912年写成的《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印发了讲义《小说史大略》(新朝社1923年出版时更名《中国小说史略》);胡适1922年为民国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编写的讲义《国语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修订本更名《白话文学史》),这些代表20世纪前期主要文学研究新成就的著作,如果没有观念的更新,是不可能诞生的。即使诞生了,也不会被学术界所认可。因为按照传统文学观念,戏曲、小说、白话文等,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谁会承认它们是文学?当然也不会承认研究这些东西是正儿八经的学术。

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更新观念,不仅传统文学研究还会走汉学、宋学的老路,中国现代文学也不可能发生和发展。试想,如果不承认戏曲和小说,如果不承认白话文的地位,哪里还有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呢?

创造新观念始终是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不仅20世纪前期如此,20世纪中期和后期也是如此。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提倡“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学’”,五六十年代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工农兵文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提倡的“纯文学”,都对当时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都是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当然,文学观念问题虽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它并不必然将文学研究带上正确的轨道,

指引文学研究取得辉煌成绩。因为学者们的研究难免会受到时代社会思潮和自身利害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知识结构和理论修养的制约,尤其难以摆脱社会政治对它的强力操控。然而,不管怎样,创新观念的前沿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文学观念的讨论,反思所谓“纯文学”,从新提出“大文学”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在检讨20世纪的文学观念,寻找文学观念的创新与突破。因为20世纪文学观念的更新虽然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但也带来了许多限制文学研究的新障碍,而新世纪如果不能在文学观念上有所反思和创新,就难以推动文学研究继续前进,也不可能取得代表新世纪新时代的文学研究新成就。因此,当前对20世纪文学观念的反思、研究,以及对中外文学观念的比较、分析,甚至对文学的本质和功用、文学的形式和载体的理论探讨,都是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必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促进文学研究的新发展。

近几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在《文艺研究》发表的《“观乎天文”中国文学观念的滥觞》、《“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游夏文学发微》,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学的进化与退化——20世纪的一种文学史观的检讨》、《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视角转换》,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的《“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等文,之所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杨继成:您在论著中多次提到,文学研究离不开材料,新材料的发掘和使用会给文学研究带来创新。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齐洲:我在一些论著中提到的材料,是指一切能够为文学研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文物、档案以及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等等。应该指出,历史学最重材料,学界称之为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有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学就是史科学”。新的材料的出现,往往会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说过:“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学术研究的新成就、新进展也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新材料的发现和发现,甚至会诞生新学问、新学科,其前沿性自不待言。例如,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诞生了20世纪长盛不衰的“甲骨学”。1900年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诞生了20世纪的世界性显学——“敦煌学”。

从1901年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遗址发现50枚晋代木简开始,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先后被发现,促进了20世纪前半期的简牍学研究。

20世纪后半期,仰天湖楚简、长台关楚简、藤店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慈利楚简、王家台秦简、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放马滩秦简、郝家坪秦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双古堆汉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八角廊汉简、仪征汉简、尹湾汉简、走马楼吴简、马鞍山吴简,等等,相继出土,总数已达20万枚,还有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这些新材料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至今方兴未艾。

杨继成: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在旧有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一旦有了新材料,加上创新观念的指导,就必然会带来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的创新吗?

王齐洲:是的,文学研究一旦有了新的材料,加上创新观念的指导,就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从而产生新的认识,改变旧有的结论,取得创新性成果。例如,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我们不仅可以确认西汉社会流传的除齐、鲁、韩、毛四家诗外,还有其他系统的《诗经》在流传,而且对诗大序、小序及其与子夏的关系会产生新的认识。

再如,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兰赋》、《鵩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唐勒(赋)》和江苏连云港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赋)》,可以证明赋体

文学在先秦已经成熟,现存宋玉赋作并非如学术界所公认的仅《九辨》一篇可信;秦汉时除文人赋外,民间赋也颇发达,赋的社会功用值得重新检讨。

再如,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可以得知,死而复生的故事并非始于晋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而《墓主记》完全可以视为一篇志怪小说,则小说的观念需要重新思考。

还有,史书说秦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传统的理解以为“书同文”就是将六国文字统一为秦的小篆,并说小篆是秦相李斯在秦大篆的基础上创制,后来秦吏又将小篆简约为隶书,然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埋葬在秦统一以前,其所使用的却都是隶书,这就推翻了上述的传统认识。实际上,所谓“书同文”是指公文的制作标准,即文书行政的统一化。汉胡广《汉制度》,蔡邕《独断》都谈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书。隶书;用尺一木,两行。为此为异。”

行政文书通过使用简牍的规格、字体来体现等级和褒贬,这对我们理解秦汉文学就很有启发。例如,有人以汉人称小说为“短书”来证明汉人对小说的轻视,自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河北定县八角郎汉简《论语》简长16.2厘米,合汉尺七寸,与经书简长一般在55厘米左右相差甚远,因此,“短书”并非与遭到社会轻视必然联系在一起,而有时仅仅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论语》在汉代为“短书”就是一证。

杨继成:新材料的出现,一定能产生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吗?

王齐洲:也不一定。如果以为有了新材料,就自然有学术创新,那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甚至抄写了几条新材料,就以为是在做前沿研究,那也是很幼稚的想法。新材料的出现只是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还需要有眼光的研究者去发现,去解读,真正发挥这些新材料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并非只有出土材料才是新材料,一切未被人发现和使用过的材料都是新材料,这些材料的发现和解读同样能够产生创新性成果。例如,解放后一直争论不休的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的问题,曾长期困扰学术界,影响人们对《水浒传》和宋江的评论,后因美国学者马泰来1984年在《四库全

书》中发现李若水《忠愍集》的《捕盗偶成》一诗而被彻底解决,连长期坚持宋江未曾投降的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也终于承认,宋江投降是“铁案如山摇不动的事实”。

发现新材料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于此可见一斑,它的前沿性也为这段学术史所证明。

此外,文书、档案、抄本、口传等,都是新材料的渊藪,只要有创新的理念、开阔的视野,善于做有心人,就可能发现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这样的学术研究当然都具有前沿性。

杨继成:您前面提到,文学研究的选择性创新离不开新方法的创新,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创新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齐洲:如果一个学者有了新观念、发现了新材料,又掌握了新方法,这就如虎添翼了,学术创新自然水到渠成,他的研究也一定处于学术前沿。

王国维无疑是20世纪最有学术创新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其学术成就时,就特别提到他采用的学术方法,即学界通称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前沿性成果,都的确与他采用“二重证据法”有密切关系。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常常提醒读者,他的研究不是要大家记住他的结论,只是告诉大家一种方法。他把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运用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通俗小说的研究,而基本思想是杜威的“实证主义”。考据方法虽然不是新方法,但在“实证主义”指导下运用考据来研究通俗小说,在当时又的确是一种新方法。

而正是创新的理念加上创新的方法,使胡适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一直处于学术前沿,不仅开创了“新红学”这一文学研究新流派,而且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带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崭新平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也注意了新方法的引进,如“老三论”、“新三论”、“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在一定时期内给学术界带来过一些新气象,也取得过一些新成绩,但总的来说,离学术界预期的成绩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便告诉我们,方法毕竟是工具性的,辅助性的,最根本的还是观念和材料。

还需指出,引进外来方法必须与中国传统方法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理想的效果。同时,如果没有观念的创新,没有材料的深入挖掘和正确运用,再好的方法也产生不出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也就很难说这种研究是前沿性的。

杨继成:理解了文学研究如何“选择性地创新”,对期刊编辑的选稿策划无疑是有帮助的。期刊编辑的职责是进行“创新性地选择”。编辑在众多的来稿中选择发表什么样的稿件,是与编辑的学术眼光、兴趣爱好相关联的,也是与编辑所在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基本学术定位相关联的,同时,更是与编辑对学术前沿问题选择性创新的理解相关联的。那么,编辑应该怎样对自己的期刊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

王齐洲:应该看到,多数期刊编辑都愿意发表那些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发表能够解决学术前沿问题的稿件,以自己编辑的刊物能够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为荣。这既是编辑对学术的尊重,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也是编辑对读者的尊重。如果一份期刊发表的真的都是“垃圾”文章,期刊编辑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甚至厌倦,因为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也得不到学术界和读者的尊重,他是不会有成就感的。因此,作为期刊编辑,必须对自己的期刊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既是学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期刊编辑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一份高品位的学术期刊,其基本定位一定是公共学术平台,面向海内外所有研究工作者,以发表学术前沿的最优秀成果为追求目标;其编辑的眼光一定是敏锐的、独到的、挑剔的、甚至是苛刻的。这样的刊物大都有较高的学术声望,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学术稿件,有严格而合理的审稿、用稿制度,能够保证审稿、用稿的客观公正;其编辑也受过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能够与作者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和学术队伍状况,知道哪些作者处于学术前沿,什么样的文章反映了当前学术前沿的学术水平。

这样期刊的编辑,其职责已不限于选稿,而是在带有策划性质地组织稿件,参与到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的活动之中,真正做到了“创新性地选择”。因为这样的期刊稿源充足,优质稿件较多,编辑选择几篇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稿件并不难,难就难在选择真正能够体现本刊办刊宗旨与特色的

高水平稿件,选择真正代表当前学术前沿动态和学术研究进展的创新性成果予以发表。

所以,高水平期刊的编辑常常要密切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追踪学者们的研究进展,有目的地约请适合本刊需要的反映学术前沿动态和研究进展的高水平稿件。而处于学术前沿的作者,一般也关注着学术期刊的动态,愿意将自己最满意的成果交由有特色的高品位的学术期刊发表,以扩大学术影响。这样,期刊、作者、编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也互相理解。这是所有学术期刊和期刊编辑都期待的一种理想状态,也是学者们期待的一种理想状态。

杨继成: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大多数期刊,尤其是一般院校的学报,都不可能达到上述理想状态,结合您的工作实践,您认为这些编辑应该怎样对自己的刊物准确定位?

王齐洲:具体就高校学报而言,即使是已经进入教育部名刊进行建设的19家学报,也难以达到上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因为,高校学报学科覆盖面太广,而专业编辑人手有限,就具体专业而言,很难与专业期刊形成竞争优势。不过,绝大多数在建名刊都选择了依托本校优势学科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办好体现自己刊物学术特色的重点栏目,努力将学报打造成为公共学术平台,向高品位学术期刊迈进。

就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而言,我们依托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点打造“中国农村研究”和“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史研究”两个特色栏目,使之具有前沿性和高水平。特色栏目聘请著名专家主持,栏目文章由责任编辑与栏目主持人共同策划,每期都有相对集中的主题,既从自然来稿中精心选择优秀稿件,又有针对性地约请国内外名家赐稿,保证每期栏目文章都能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样就整体提升了学报的质量,扩大了学报的学术影响。并且,这些特色栏目还有专业期刊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例如敝刊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可以整合各个学科,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艺术学,只要是研究“三农”问题的论文,都可以在这个栏目内发表,这是专业性期刊不可能办到的。

从实践情况来看,效果也颇为理想。仅这两个栏目,每年发文30来篇,被“三大文摘”转载的文章都在20篇次以上,而其中有不少是海内外知

名学者的佳作。

还应该看到,即使是未能进入教育部名刊的学报,也在尝试着办好一两个名栏,以提升学报的学术质量,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的“青少年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民族音乐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蒙古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湖湘文化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经济与管理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的“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研究”、《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扩大了学报的影响。

杨继成:目前,大部分高校学报不是教育部名刊,也没有教育部名栏,没有进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或其他重要的数据库,这样学报的编辑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

王齐洲:我认为不能妄自菲薄。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学报都是以发表本校学术成果为主,将学报定位为本校学术园地,这对学报发展肯定是不利的。由于一个刊物只是一个学校的学术园地,学术界关注度会大大减小,学术影响力会大大降低,这样,本校优秀稿件也大多不愿在自己的学报

上发表,编辑只能在一般性稿件中选择相对好一些的稿件来发表,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大家都不重视学报。

然而,学报编辑如果真想有所作为,仍然是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例如,文学编辑可以针对本校文学学科的特点,选择有相对优势和前景的学科方向,特别是具有本土特色和优势潜力的方向,扶持有一定基础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学者,为他们提供学术前沿信息,坚持不懈地推出有一定水平的学术成果,逐渐形成本学科方向的学术优势,这样,不仅促进了本校的学科建设,培育了学术队伍,也形成了自己学报的学术特色。

当然,这样做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但只要认识一致,目标明确,持之以恒,还是有可能突破现状,结出丰硕的果实的。

(后记:与王齐洲教授虽然是一面之交,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渊博的学识感染了我,在多次的邮件往来中,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本访谈参考了王教授的一些其他资料,经王教授审阅同意后发表。王教授在百忙之中对本刊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Selectiv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Study and Innovative Selection of Journal Editor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Qi-zhou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YANG Ji-cheng¹, GUO Zi-yuan²

(1.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meeting on proficiency training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frontier for the editors of University Journals sponsored by the Society of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was held on August 23, 2009. Professor Wang Qi-zhou was invited to give a lecture at the meeting entitled the frontiers of literature studies and editor's choices of contributions, which acquired strong repercussions. Professor Wang pointe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innovation. A researcher can only choose certain areas and even a certain direction of the field for his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thus innovation cannot be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but a selective innovation. An editor's responsibility is to select and publish those achievements that are innovativ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studies. The selections are not without limitations. It reflects the unique view and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the journal. Therefore, editors are making innovative selections. Selective innovation and innovative selec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constitut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fter the meeting, the author interviewed Professor Wang on the issues of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studies, the selective innov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selection, etc.

Key words: literary study; frontier issues; editorial planning; professor Wang Qi-zhou